

英国报界与苏伊士运河危机

(英) 拉夫尔·奈格林 著* 赵 昕 译**

内容提要 拉夫尔·奈格林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前任院长,新闻研究所的政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政治传播领域。他在本文指出,英国各大报社的报纸销量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确有所涨落,且各报因立场不同分为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事发多年后,围绕新闻报道和危机问题仍旧迷点重重。虽纪尧姆·帕门蒂尔及塞西尔·金等人对报纸销量与立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本文通过对一系列数据的研究和分析,对当时的这些共识提出了质疑。事实上,与读者观点相悖同报纸发行量降低这二者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影响报纸销量的因素众多。

关键词 苏伊士运河危机 英国报界 报纸销量

1956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无疑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水岭。英国武力对抗埃及的决定并没有收到预期的胜利效果。为二战胜利欢呼雀跃的英国却遭遇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挫败,严重动摇了其国际地位,世界政治话语权亦惨遭削弱。如果说1939年9月英国对自身的军事实力尚不确信,但至少英国国民团结一致、目标明确。相较而言,1956年英国对苏伊士的军事入侵从开始到结束,英国公众却始终对政府此举争论不休。事实上,在英国现当代史上,很少发生像苏伊士运河危机这样足以分裂民族情感的事件。

* (英) 拉夫尔·奈格林教授(Ralph Negrine),英国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新闻学院前任院长,新闻研究所的政治传播学教授,曾在英国莱斯特大学任教。拉夫尔·奈格林在政治传播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著有《政治传播的发展》《欧洲议会选举的政治传播》《欧洲媒体、政治》等。

** 赵昕,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然而，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切地评价英国新闻界在公众舆论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其对英国对埃及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但非常明确的是，在关于“政府对纳赛尔和苏伊士运河所实行政策的利弊”之争中，英国报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毋庸置疑，各大报社对此所持的立场大相径庭，这对新闻自由民主理论的发展亦有重大意义，但无法确定不同报社所持观点究竟对读者、公众舆论抑或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多大影响。

事发 25 年后，围绕该事件的新闻报道仍然疑点重重。最近纪尧姆·帕门蒂尔（Guillaume Parmentier）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英国新闻报道》（*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一文中提出了一些引人注意的看法。^① 在描述全国各报之间的分歧以及各报对国家干预埃及政策的普遍敌视态度（他这样说显然有所夸大）时，他记录了一些报社立场突变的现象。虽然该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闻报道、公众舆论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他的分析至少存在如下两点缺陷。

第一，他指出，政府干预政策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公众舆论认为……不合时宜”^②，或者说“从公关角度而言不合时宜”^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提到“即使报界在同情政府的处境时，也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政府政策的目的”^④，并说某些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以下简称《卫报》）和《观察家报》等甚至“建议政府应谨慎行事”^⑤，这在无形中支持了政府在 1956 年 7 月 26 日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当即”^⑥ 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计划。这一分析引出了若干具有争议的问题。不言而喻，理解政府政策的目的并非媒体的职责或角色——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媒体的职责应当是提出批评。英国广播公司顶住政府的重压，坚持批评国家对埃及的政策便证明了这一点。但政策透明度不高就另当别论了，尽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帕门蒂尔对危机及其所引发的最终结果所做的评论也存在一个

① G. Parmentier, “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 in *Historical Journal*, XXIII, 2, 1980, pp. 435 - 448.

② G. Parmentier, “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 p. 435.

③ G. Parmentier, “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 p. 438.

④ G. Parmentier, “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 p. 435.

⑤ G. Parmentier, “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 p. 436.

⑥ G. Parmentier, “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 p. 438.

不足之处,这与第一点一脉相承。在使用“不合时宜”和“公关”作为解释因素时,他表示报界和公众的立场经常反复无常、飘忽不定,这是缺乏哲学思想或意识形态的表现。而他以“两大报纸”^①即《卫报》和《观察家报》为例,认为二者支持政府决策,并起到了趁热打铁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更是大错特错。笔者认为,帕门蒂尔将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分析得过于简单化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忽略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各报纸之间的严重分歧——特别是《卫报》《观察家报》《每日镜报》与其他报纸之间的分歧。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②《观察家报》《每日镜报》《卫报》等报刊反对政府政策,由此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正如塞西尔·金所指出的“《每日镜报》销量净亏损约80000份。曾赶上《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观察家报》销量下降,并从此一直居于其后。但《卫报》的销量却有所增加。这些报纸的读者大多反对军事冒险,但一旦本国军队卷入战斗他们肯定会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③奇怪的是帕门蒂尔并未提到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关于报界的这些描述。所以笔者将在本文详细探讨这些要点。

—

正如帕门蒂尔所言,英国各报纸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及政府干预问题上所持态度不同。1956年7、8月,在埃及刚刚接管运河后,“英国报界以压倒性多数赞成的强硬态度对抗纳赛尔”。^④但到了10、11月,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空档期”,“许多报纸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⑤在是否支持政府介入苏伊士运河危机一事上犹豫不决。然而,帕门蒂尔所描述的情形并非无可辩驳。笔者认为在整个危机期间,新闻报道与公众舆论之间的确存在分歧,但仅凭借7月到10月之间的“长时间的空档期”,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分歧存在的原因。而且,仅以“长时间的空档期”作为解释,也

① G. Parmentier, “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 p. 438.

② C. King, *Strictly personal*, London, 1969. 同时参见 P. Hirsch and F. Gordon, *Newspapermoney*, London, 1975; M. Edelman, *The Daily Mirror: A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1966; J. Westergaard and H. Resler, *Cla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77, p. 269.

③ C. King, *Strictly Personal*, p. 131.

④ G. Parmentier, “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 p. 436.

⑤ G. Parmentier, “The British Press in the Suez Crisis,” p. 438.

表明对公众与报界之间的敌对程度和本质缺乏认识。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英国报界以预料中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展示了他们对纳赛尔此举的极度厌恶。“独裁者”成为各报纸在描述纳赛尔时惯用的词。但除了这一即兴反应，在关于政府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方面仍有分歧，其实这些分歧早从8月5日开始就已明显存在，并贯穿整个苏伊士危机。《每日镜报》《卫报》和《观察家报》赞成英国诉诸联合国进行“集体国际行动”^①。正如《观察家报》评论道，这比采取“军事行动”略胜一筹。^②然而，虽然《每日镜报》和《卫报》立场明确，认为集体国际行动是优先之选，但不放弃诉诸武力的权力。“政府在苏伊士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无可厚非。因为如果纳赛尔上校关闭运河——但只有这件事发生时——英国就应进军埃及。但目前尚无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因为纳赛尔并没有违背1888年的《君士坦丁堡公约》。”^③《每日镜报》随之附和此观点，于8月14日提出“不对埃及进行战争”的口号，这反映了其反对军事干预的强硬态度，也表明各报纸之间的分歧正在不断加深。《每日镜报》坚决认为艾登亟须摆脱充满危险性的妄想，在既具挑战又充满变数的事态下，这种妄想使他遭受着来自英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他绝不可将自己的大胆言论付诸实践，并受外界战争叫嚣和炮舰外交的影响而做出轻率的举动。“战争叫嚣”和“炮舰外交”由《泰晤士报》《每日快报》和《邮报》主张，三者主要在对埃及的行动方式上与《每日镜报》观点不同。以“报界英雄”为特征的它们要求“即刻复仇”，提醒读者牢记英国过去所倡导的对纳粹德国实行的绥靖政策，坚定地主张对埃及发起军事行动。

英国整个新闻界的内战不仅表明报纸行业存在意见分歧，而且反映了由各报立场所引发的公众分歧。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新政治家》察觉到政府已然不得民心，因此将此战视作“艾登之战”^④。该评论非常恰当，因为英国的苏伊士政策掩盖了缺乏公众支持和含有私人恩怨这些因素。相反，《快报》和《邮报》却竭尽全力支持政府，“虽然向纳赛尔之举致敬之潮如洪水般，它们仍然全力保持热情高涨，幸运的是，有些编辑部的热情逐渐

① The *Observer*, 5 August 1956.

② The *Observer*, 5 August 1956.

③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4 August 1956.

④ The *New Statesman*, 18 August 1956.

有所消退”。^①1956年9月,英法联军登陆塞浦路斯(Cyprus),这被视为炫耀武力的举动,也是对埃及作战的前奏。《卫报》宣称此时政府正在“剥开裹在军刀周围的棉絮”^②。《每日先驱报》的态度则比较温和,但与《卫报》大同小异,将英法登陆描述为“鲁莽且错误的”行动。《新闻纪事》也认为此举不仅“错误”而且“毫无意义”。《每日快报》认为此次登陆象征着“两个国家为捍卫本国的切身利益而采取的联合行动”^③。

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政治角度,以上差异与分歧都太过欲盖弥彰。的确,唯有在此紧急关头,战争叫嚣之说与报界英雄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在此背景下鼓吹反政府路线者甚至可能背负“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之骂名。^④《每日镜报》在受到上述指责后,认为不仅要为自己的异议辩护,而且要捍卫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刊物来反对那些“叫嚣战争并迁怒于其他刊物的报纸”,“危机期间《每日镜报》以与这些志同道合的刊物站在同一战线而感到自豪”。^⑤《每日镜报》在许多方面用抗议的呼声证明了自身价值。早在9月1日,《每日镜报》就在头版刊载了一篇《卫报》关于苏伊士危机的社论。三天后,即9月4日,《每日镜报》完全重新设计了报纸的首页和尾页,制成了双面刊,刊登其“盟友”报社的一些社论。通过汇集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卫报》《观察家报》《每日先驱报》《新政治家》《经济学家》《每日镜报》,不仅鼓舞了反对派,而且证明了反对派分布的广泛性。它呼吁整个国家团结一致,正如它曾质问读者“难道他们(其“盟友”报社)都是骗子和谣言散布者吗?”

《星期日泰晤士报》声称社会分裂是由部分媒体造成的,这忽略了《新闻纪事》所做的两项民意调查。调查表明,4/5的选民“认为争端应该提交联合国”,而且大多数人赞成通过“协商解决”危机。^⑥随后,报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动荡,社会局势也弥漫着紧张气息。甚至随着10月30日入侵危机达到高潮时,两大主要周日报纸对形势的认识仍大相径庭。对《星期日

① F. Williams, “Fleet Street Notebook,” in *The New Statesman*, 25 August 1956.

②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quoted in Williams, *The New Statesman*, 8 August 1956.

③ F. Williams, *The New Statesman*, 8 September 1956.

④ *The Sunday Times*, 9 September 1956.

⑤ *The Daily Mirror*, 12 September 1956.

⑥ *The Daily Mirror*, 12 September 1956; *The New Statesman*, 15 September 1956. 同时参见 J. Owe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XXI, 1957.

泰晤士报》而言，入侵是“一段艰难但无畏的进程”^①，但在《观察家报》看来，这事关国家兴亡，并于11月4日宣布其完全反对军事干预，并认为此次入侵与上个月发生的俄罗斯入侵匈牙利事件同属一丘之貉。《观察家报》在简单的标题“艾登”下，这样写道“我们从没想到我们的政府竟如此愚蠢，如此不择手段……英国那阴险的最后通牒会遗臭万年，也必将被埃及拒绝。艾登政府早已在国际上名誉扫地。在我们看来，安东尼·艾登必须卷铺盖走人。”上述篇幅说明了各报纸间的分歧之深。而7月到10月之间的空档期并不能成为各报纸立场发生变化的原因，但可能使双方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如帕门蒂尔所言，“反苏伊士”报纸确实存在，否认这一点就是“歪曲事实”。^②这其实开了对危机期间的报界进行评论之先河，但同时也造成英国新闻界一大谜团，上述分歧所造成的结果一直令人迷惑不解。

二

奇怪的是，帕门蒂尔没有提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给抨击政府的部分报纸所造成的影响。对此，塞西尔·金提出一些报纸发行量所发生的变化，是反政府社论对这些报纸产生不利影响的直接结果，这种说法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解释。实际上，塞西尔·金对此事的解释只稍作修改就再版发行，并被大众接受，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同时被视为对报纸出版风险的准确评估。因此，埃德曼在《每日镜报》发表的自传中曾直白地声称“《每日镜报》由于反对政府的苏伊士政策，发行量减少了70000份”^③。休·卡德利普在谈及报纸发行量下降时也支持埃德曼的观点。他写道，《每日镜报》“偶尔很受欢迎时，它的观点却是错误的；往往不受欢迎时，它的观点却是正确的。时间将见证苏伊士事件”^④。

有辨别力的读者会谨慎留意报纸的编辑思路，如果发现报纸与自己的观点背道而驰，就会转向支持别的报纸。这与另一些研究所表明的读者“乐意”接受“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社论观点”不符。的确，“读者是否认为

① *The Sunday Times*, 4 November 1956.

② Parmentier, "British Press," p. 447.

③ M. Edelman, *The Daily Mirror: A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1966, p. 159.

④ H. Cudlipp, *At your Peril*, London, 1962, p. 112.

报纸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功能，是值得怀疑的，更不用说服务党派与沟通的功能”。^①

新闻作为一种商品，必须受欢迎才能得以畅销。然而，报纸不只包含“新闻”这一种成分，而且也很难辨别其中哪些部分赋予报纸鲜明特征并受到追捧。令人惊讶的是，赫希和戈登在对报纸做出极具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分析时，竟用苏伊士危机来支撑其论点——“从长远来看，反应迟钝的报纸如同死者”^②。为了证明报纸如果不考量读者的喜好其销量将逐渐减少直至难以获利，赫希和戈登聚焦于1956年，认为“《观察家报》因苏伊士问题挫败后，再也没能恢复其原有销量，《卫报》的销量从此也开始下降”^③。但他们的上述论点，尤其是就苏伊士运河危机一事而言，没有意识到发行量、事件报道及对这些事件的评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关系是以“反应”概念为基础的商业法无法准确捕获的。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出于忠诚，人们只愿意购买同一种报纸，这已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所以这些评论员的观点有失偏颇，往好的说，是这些评论员误读了发行量数据；往坏的说，是他们过度简化了读者情感所引发的复杂过程。

三

与读者观点相悖同报纸发行量降低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如果将读者来信当作其中一个衡量指标，那么塞西尔·金等人的说法还有待商榷。《观察家报》在11月4日发表了强烈的反艾登社论后，收到了大批读者的来信，截至11月11日总共收到了1227封信，其中866封信反对该报的立场，302封予以支持，其余59封只表达了中立评论。《观察家报》指出，在上述866封反对信中，有474位读者表示他们不再愿意订阅此报。尽管部分读者做出了这一决定，但当天（11月11日）报纸经销商对该报的订购量却高于以往，且达到该报有史以来的销量最高点。接下来一周，《观察家报》又制出一张表格：记录了其在11月11日到18日之间收到的信件数量。表格非常清晰地表明，《观察家报》的读者正在纷纷转而支持它，来信

① C. K. Seymour-Ure, *The Press, Politics and the Public*, London, 1968, p. 57.

② Hirsch and Gordon, *Newspaper Money*, p. 21.

③ Hirsch and Gordon, *Newspaper Money*, p. 21.

中包括 1851 封支持信，619 封反对信，还有 143 封信表示中立。^① 但自从“来信潮过后”，《观察家报》再没公布后续表格。^② 《卫报》也有过类似做法，“它公布读者来信中约 1/10 与其观点一致，同时也有约 1/3 来信对其表示批评”。^③ 此后明确划分立场成为各报纸的普遍模式，《星期日泰晤士报》等亲艾登报纸也是如此。^④

读者来信并不能作为塞西尔·金等人研究案例中的有力数据，因此，它也不可用作衡量发行量变化的综合指标。然而，由于评论员没有记录销量变化的确切时间和特点，人们只能对这些变化的发生做出推测。但如表 1 所示，无论是发行量下降的总趋势，还是受偶然事件（如《观察家报》在 11 月 4 日发表了激烈言论）影响引发的销量急剧变化似乎都不明显。

表 1 各报月净销量

	《每日镜报》	《曼彻斯特卫报》	《观察家报》	《星期日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	《每日快报》
1956 年 7 月	4772000	160648	622711	627615	220796	4097000
1956 年 8 月	4717000	156237	611035	622354	216113	4112000
1956 年 9 月	4742530	163412	625080	624557	218242	4111000
1956 年 10 月	4720699	171605	640761	674360	224001	4118000
1956 年 11 月	4746933	181775	659613	680378	230523	4158000
1956 年 12 月	4632409	178206	641628	677633	226256	4101000
1957 年 1 月	4647000	175799	629630	684784	230728	4096000
1957 年 2 月	4635000	175931	643174	741255	229999	4110000
1957 年 3 月	4660000	175059	643854	744297	231753	—

* 本数据由相关报纸机构及发行量审计局提供。日销量数据无法获得。

尽管使用月平均值这一数据有许多缺陷，如不能显示每月的具体变化，但确实也能体现一些引人关注的要点。表 1 所列报纸的月净销量或多或少都有所涨落。其实这种波动非常普遍，并被公认是报纸销售过程中可能经历的一个环节。而且，某些波动很正常，也很容易理解。例如在节假日期间，

① The *Observer*, 18 November 1956.

② The *Observer*, 25 November 1956.

③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8 August 1956.

④ The *Sunday Times*, 11 November 1956.

报纸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对《卫报》而言,由于读者在7月到12月期间会外出度假,该半年的月平均发行量便少于同年1月到6月的月平均发行量。对《每日镜报》而言,在夏季6、7月的发行量趋于偏高,与此相比,10、11月偏低。将这些变化综合考虑,长期来看报纸销量将呈现出一种有规律的峰谷模式。例如,虽然1956年7月到8月《每日镜报》的销量显著下降,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属于正常波动:1957年同期,其销售额也有所下降,从4729000减少到4696000。因此,归纳报纸发行量波动的定因几乎是不可能的:若回顾以往的波动,能够发现影响销量的诱因众多。

此外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问题。如表1所示,1956年12月《每日镜报》发行量与11月相比出现大幅下降,但如果认为这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影响的结果,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太过牵强。虽然《每日镜报》对政府政策的批评一度成为读者不再订阅该报的最好理由,但如果真如数据所示,《每日镜报》此举真的造成了读者的大量流失,那么11月就会出现发行量下降,而不用等到12月。这些数据似乎说明读者的反应略有迟钝。

另一个反常现象是,表1所有报纸在7月到12月期间的平均销量高于上半年平均值,同时达到几年来的峰值。这或许显示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对报纸发行量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表2的数据也并未显示《每日镜报》曾遭遇过“一次重大挫折”,塞西尔·金之后也重申过这一说法。^①同样,如果将《每日镜报》《卫报》和《观察家报》发行量的下降与特殊事件联系在一起,那么《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每日快报》在此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可见表1)?这些矛盾证实,影响报纸销量的绝非单一因素。这尤其适用于反驳《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传记作家,他们声称“《观察家报》的读者数量迅速骤减,或许一周读者就减少了30000左右”,“《卫报》在短短几天内也失去了30000到40000名读者”。^②这也可以反驳比尔·格伦迪的评论——《卫报》“发行量遭遇了巨大落差,从约200000份骤降到120000份,因为读者反对该报采取的立场”。^③

① 1979年秋,塞西尔·金曾与作者进行私人通信。

② H. Hobson, P. Knightley and L. Russell, *The Pearl of Days: An Intimate Memoir of The Sunday-Times*, London, 1972, p. 296.

③ B. Grundy, *Inside the Press*, London, 1976, p. 52.

表2 1955 - 1958 年每半年度月平均发行量

报纸	1955 年 1 ~ 6 月	1955 年 7 ~ 12 月	1956 年 1 ~ 6 月	1956 年 7 ~ 12 月	1957 年 1 ~ 6 月	1957 年 7 ~ 12 月	1958 年 1 ~ 6 月
《每日镜报》	4725122	4694042	4649696	4723131	4558793	4657873	4526453
《曼彻斯特卫报》	156154	154140	163535	163773	176924	172715	178692
《观察家报》	564307	573632	601402	633064	641417	633537	638074
《每日快报》	4036137	4075839	4042334	4116157	4127085	4111193	4040572
《泰晤士报》	221972	217903	220705	222593	232705	239951	248248
《星期日泰晤士报》	—	—	618540	650274	740133	776175	

他们的评论都过于简单片面。《观察家报》的编辑大卫·阿斯特在 1956 年曾评论说，在整体背景中才能看出，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个分水岭事件，他指出“我们也看到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观察家报》的主要竞争对手、持不同立场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所产生的影响。虽然《观察家报》的销量大致保持稳定，但令人吃惊的是，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畅销趋势却遭到了减缓。与此同时，《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却急剧上升。”^①一些评论员也指出，许多公司因为在苏伊士运河危机问题上完全不同意某些报纸采取的立场，因而不再在这些报纸上刊登自己的广告。因此，对于《观察家报》而言，“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其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损失，是大量原有广告商的流失。而且这一后果一直持续了 10 多年”。^②遗憾的是，由于时隔太长，重新研究这一课题非常困难。由于广告商在出版业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急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领域。

四

前文所分析的数据对以往共识提出了严重质疑。这些数据的确表明苏伊士运河危机对报纸及其发行量有所影响，但同时帕门蒂尔关于报纸销量与其立场的解释提出了质疑。然而，为何帕门蒂尔对苏伊士事件和报纸之间关系的误判却成了流行观点？这一误判提出了读者持有的那些理性且

① 1979 年夏，大卫·阿斯特 (David Astor) 的私人通信。

② 1979 年夏，大卫·阿斯特 (David Astor) 的私人通信。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见解,似乎认可了个人在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读者不再是孤立的,而成为民主进程的参与者;对报纸的购买已变相转化为“用脚投票”的行动。公众不再购买一种报纸或继续购买一种报纸,都具有政治意义,同时也表明公众参与了政治进程。因此报纸“代表读者讲话,就剥夺了读者的政治权利,而对读者而言,政治生活不是他们能够做出有意义举动的一个领域”。^①

但是,如果报纸想要取悦读者,它必须明确读者的倾向;虽然新闻记者和编辑知道如何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出现的道德困境和政治困境,但许多因素表明,他们对与读者及其他报纸意见一致的程度非常不确定。因此,试图不再支持政府政策(而这一政策坚持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报纸,并不清楚自己的立场已与读者观点发生了分歧。为了得到广泛认可与支持,这些报纸不仅通过互发社论和联合对抗战争叫嚣者以示互相支持,而且以简单的“支持/反对”格式将读者来信提升到突出位置,如果读者完全支持报纸观点,这样它们就能轻易反驳对其“不负责任”和“传播异议”的指责。由于缺乏表明支持度的确切材料,所以真实情况总是难以断定。而本文通过解释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建立描述变化的恰当模型,克服了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无论由何种原因引起的发行量变化都可以归因为“边缘”读者不再订阅该报,言下之意即是大体上读者都支持与自己观点相符的报纸。作为政治危机影响的结果,发行量变化也成为解释英国报业行为的原因和证据。

[责任编辑:刘金虎]

^① G. Martin, “The Press,” in D. Thompson (ed.), *Discrimination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1973, p. 90.

The British Press and the Suez Crisis

Ralph Negrine , translated by Zhao Xin

Abstract: Ralph Negrine is the former dean of the journalism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and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t the Journalism Institute , mainly studying the field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is paper ,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spaper sales of each British newspapers did fluctuate during the Suez Crisis , and the newspaper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s , arguing with each other. Many years after the event , there still remains a shroud of mystery surrounding the press and the crisis. Guillaume Parmentier and Cecil King had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respectively on the issue of the newspaper's sales and position , which were then accepted by public. Bu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data , this paper cast doubt on the common-sense. In fact , There is no a inevitable reason why disagreements with readers' views would result in circulation losses.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ales of newspapers are numerous.

Keywords: the Suez Crisis , the British Press , Newspaper Sales

Russ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urkey at Present

Wang Jin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olitical events in Middle East of the past year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key-Russia bilateral tie in 2016. Although the Turkey-Russia tie was significantly frayed by after November of 2015 when Turkey downed Russian fighter , the bilateral tie started to normaliz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The normalization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urkish leadership changes , Russian economic sanction , Turkish domestic terrorism pressure and the deteriorating